

“老车评论”系列解读

特朗普2.0与我们的应对（二）

万斯国际政治与经济政策主张解读

第二篇

CIFER团队/编著



- 万斯上台和美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变革有何联系？
- 万斯提出对全球化模式的“两个批判”是什么？
- 万斯国际政治与经济政策主张的逻辑框架是什么？
- 万斯政策主张与“美国优先”原则有何共通之处？
- 万斯政策主张将如何影响全球贸易与安全格局？



扫码了解更多详情

报告说明

本文依托 CIFER AI 模型，系统梳理了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的自传《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及其公开演讲，并从中提炼其国际政治与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要点。

在模型解读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以确保分析准确性和内容可理解性：

- 1. 准确性：**模型分析应忠于原文内容，避免主观引申或误读，并完整地保留原报告的结构与逻辑。
- 2. 可理解性：**模型输出结果应通俗易懂，确保具备中级经济学知识背景的读者（如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能够轻松理解报告内容。

模型分析完成后，我们对输出结果进行了人工校对、审核与修改。

全文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网站](https://cifer.pbcfs.tsinghua.edu.cn/)上线发布。

<https://cifer.pbcfs.tsinghua.edu.cn/>

基本参考文献

- 1. J.D.Vance,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6
- 2. 鞠建东,《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各章小结详见附录，报告解读参照相关章节如下：

中美关税争端，第 1、4 章	大国竞争，第 3 章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货币体系，第 6、7 章
大国竞争与危机演变，第 9 章	国际金融竞争，第 11 章	全球治理体系竞争，第 12 章

其他参考文献及附录：篇尾随附

关于“老车评论”项目

老车（ju）是具备鞠建东教授思想的 AI 数字人。“老车评论”APP 依托鞠建东教授数十年研究成果，融合 CIPHER AI 课题组研发训练的 AI 垂类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技术，目前已形成“论文学习-报告解读-时事分析”的立体化内容矩阵，是 AI 赋能经济研究分析的重要尝试。

项目组负责人：

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PHER）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

项目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缴洪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PHER）实习生

李元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CIPHER 研究员

刘宏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PHER）实习生

徐楚剑，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初级研究专员

杨栗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初级研究专员

关于《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鞠建东编著）运用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分析国际经济领域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大国在国际贸易、金融、技术、产业、安全与全球治理体系等领域全方位的竞争；用通俗的语言、贴切的事例、丰富的数据、深刻的洞察，在现有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基础上，创造了大国竞争的理论体系以及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应用、当代大国竞争的缘起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现状与发展。书中提出三足鼎立、竞争共存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总结其事实数据，分析其发展路径。【获取链接】<https://3.cn/2e5-BCUA>

关于 CIFER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依托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注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CIFER 以"集聚英才、扎根中国、服务世界；用思想建设新世界"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中国和世界最优秀国际经济学者的研究与交流平台，推动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应用；产出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全球发展的研究成果。中心主任鞠建东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

目 录

一．引言.....	1
二．全球化批判与制造业复兴.....	2
三．贸易与关税政策.....	5
四．技术、能源与创新政策.....	7
五．国际关系与安全观念.....	9
六．潜在影响与风险.....	11
七．结语：万斯的政策逻辑.....	12
参考文献.....	14
附录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各章小结.....	15

一 . 引言

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以下简称万斯）现任美国副总统，成长于美国“铁锈地带”的一个贫苦小镇，因此其政策主张深受个人成长经历和对美国工人阶层现状观察的影响。在担任国会参议员及美国副总统期间，他逐步形成了一套逻辑严谨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政策主张。

万斯的自传《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出版于 2016 年，揭示了美国“铁锈地带”白人工人阶级的困境，分析了贫困背后的文化与社会结构问题。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被视为理解特朗普支持者的关键文本。在特朗普 2.0 时代，万斯政策主张的核心逻辑也从该书中可见一斑。万斯关注白人工人阶层的困境与心态，其政策主张融合了“民粹主义右翼”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关注与“技术乐观主义”对创新驱动未来的信念；其核心政策框架围绕“美国优先”原则，旨在通过重塑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国际角色，复兴国内制造业，保护本国工人利益，并以更强硬、更务实的姿态处理国际关系。若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现行全球贸易和安全格局将受到重大冲击。

本文基于万斯自传《乡下人的悲歌》和多次公开演讲，系统梳理了其核心政策理念。本文从全球化批判与制造业复兴，贸易与关税政策，技术、能源与创新政策，国际关系与安全观念，潜在影响与风险，政策逻辑等六个方面对万斯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政策主张进行梳理说明，并分别解读其中逻辑和政策工具。

二．全球化批判与制造业复兴

（一）对过去全球化模式的否定

万斯对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模式持有深刻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构成了其经济政策主张的基石。他认为，这种模式在两个核心层面存在根本性缺陷，并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对其所关注的工人阶级造成了负面影响。

1. 设计与制造环节被人为割裂的谬误

万斯在美国活力峰会的演讲中，将“可以将制造与设计分开”的理念称为“全球化的第一个自负（first conceit of globalization）”³。他指出，这种模式的设想是：富裕国家（如美国）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设计、研发环节（例如产品上标注“美国设计”），而将相对低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如“中国制造”）。按照这种理论，失去制造业岗位的美国工人可以通过学习设计或编程等技能，转向更高价值的工作³。

然而，万斯认为这种设想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他强调，制造和设计之间存在紧密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实际情况是，进行制造的地区往往也会在设计能力上取得长足进步。设计产品的公司需要与制造公司紧密合作，共享知识产权、最佳实践，甚至关键员工。因此，将制造环节外包，实际上也促进了产业接收国设计能力的提升。这种全球化假设未能预见到制造能力向创新转化的能力潜力，最终削弱了美国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万斯的结论是，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在低端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开始在高端追赶，最终导致美国从价值链的两端都受到挤压³。

2. 廉价劳动力过度依赖抑制创新

万斯将“廉价劳动力”视为过去全球化模式的“第二个自负”，并将其比作一种“拐杖（crutch）”或美国企业上瘾的“毒品（drug）”³。他认为，无论是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廉价劳动力经济体，还是通过移民体系引进国内廉价劳动力，都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自身的创新动力。

他的逻辑是：当企业能够轻易通过使用更便宜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时，进行艰难的技术创新和自动化升级的动力就会减弱。企业会选择更容易的路径——削减劳动力成本，而不是投资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技术或新工艺³。他甚至观察到，在那些大量引进廉价劳动力的西方国家

(主要点名加拿大和英国), 普遍出现了生产率停滞的现象, 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联³。

万斯引用关于最低工资提高迫使企业(如麦当劳使用更多自助服务亭)自动化的争论, 来说明一个反向的观点: 缺乏廉价劳动力反而能“倒逼”企业进行创新, 而这本身是件好事³。他强调, 美国未来的竞争力不应建立在压低劳工标准上, 而是应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率³。

综合来看, 万斯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模式基于错误的假设(设计与制造分离、依靠廉价劳动力), 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 (1)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 大量工厂关闭, 工作岗位流失^{2,6}。
- (2) 工人阶层受损: 工人不仅面临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更失去了重要的个人和社区身份认同及目标感^{2,3}。
- (3) 创新能力受抑: 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使得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生产率增长放缓³。
- (4) 国家竞争力下降: 在价值链两端受到挤压, 整体经济实力相对削弱³。

因此, 万斯得出结论, 必须彻底否定这种全球化模式。他强调, 不能将这种失败的全球化逻辑归咎于创新本身; 恰恰相反, 正是这种对廉价劳动力的渴求, 才对创新造成了损害³。这一诊断为其后续提出的重振制造业、实施保护性关税、激励国内创新和严格控制移民等一系列政策主张奠定了基础。

(二) 制造业衰退的根源与后果

一个关键的论点是, 强大的本土制造业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在万斯看来, 美国制造业的长期衰落并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就业和地方经济的困境, 更已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 当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停止在国内“制造有趣的新事物”时, 其后果远超经济范畴。他进一步指出, 一个国家的国防能力, 包括生产先进武器装备和保障战时物资供应的能力, 都高度依赖于其工业基础的实力和韧性。因此, 制造业的空心化直接削弱了美国的国防潜力, 使得“和平通过实力”的理念难以有效支撑。

为了具象化这种衰退的严重性及其战略意涵, 万斯对比了美国造船业的历史与现状。他在演讲中表示, 美国曾在二战期间展现出惊人的工业生产能力, 能够以极高效率大量生产运输船只; 而如今, 美国在全球商船建造市场的份额已微不足道, 相比之下中国等竞争对手则占据了主导地位³。这个例子旨在警示, 关键战略产业能力的丧失, 可能导致美国在未来潜在冲突或

危机中处于被动地位，过度依赖他国（包括潜在对手）的供应链也带来了不可接受的脆弱性。因此，制造业衰退的后果是系统性的：它不仅导致了经济困境和《乡下人的悲歌》中所描绘的那种社区凋敝、工人失去身份认同感^{2,3,6}，更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竞争力。

（三）“美国工业复兴”的愿景

基于对制造业衰落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万斯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即实现“美国制造业的伟大复兴”^{3,6}。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复苏计划，更是一个旨在重塑美国国家认同和全球地位的战略愿景。其核心在于彻底扭转“去工业化”的颓势，使美国重新成为一个以强大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制造大国”和“创新大国”，恢复他记忆中那个“努力工作似乎总能找到好工作”的荣光时代^{3,6}。

驱动这一愿景的动力是多方面的。首先，经济层面的目标显而易见：制造业复兴将创造大量高质量、高薪酬的就业机会，提振中产阶级，让更多普通美国人能够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实现经济上的安全感⁶。其次，这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与认同诉求。万斯认为，“制造”和“建设”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兴制造业有助于恢复工人的职业尊严、重建社区的凝聚力，并提升整个国家的自豪感^{3,6}。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强大的工业基础被视为国家安全与主权的根本保障，是美国在全球舞台上保持自主性和影响力的前提^{3,6,9}。

万斯对此愿景的实现展现出相当的乐观，他相信在美国采取正确的、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下——即他所倡导的保护性关税、亲商的税收与监管改革、以及能源自主策略——美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复兴的关键时刻（“on the cusp of”）^{3,6}。他积极地将这一愿景与美国的“建设者”们联系起来，呼吁政策应全力支持那些选择在美国本土投资、创新和生产的企业家，将他们的成功与国家的复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³。万斯后续所有具体经济和贸易政策主张皆以此宏大愿景为总目标和出发点。

三．贸易与关税政策

（一）关税作为核心工具

万斯认为关税是保护美国本土就业和产业的坚固“屏障”^{3,6}。面对他所认为的来自全球（尤其是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低成本冲击，关税成为提升美国工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劳动价值、确保国内企业生存空间的“必要工具”。但这一定位并未停留在被动防御，万斯更进一步将关税视为促使制造业回流、创造高科技就业的积极引擎。他相信，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关税能有效激励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尤其当这种外部压力与美国国内的技术进步、更低的能源成本以及其他有利的营商环境因素相结合时，更能催生出具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和高薪工作岗位³。

此外，关税在他手中还是一种强有力的外交“谈判筹码”。万斯主张利用关税作为威慑和施压的手段，迫使贸易伙伴在各种议题上做出对美国有利的让步，这些议题不仅限于贸易逆差或市场准入，甚至扩展到了边境安全管控和打击毒品（如芬太尼）跨境流动等非经济领域^{8,9}。对于关税可能引发通胀的普遍担忧，万斯则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暗示，通过汇率的相应调整或配合国内增加供给的政策措施，关税对物价的负面影响可以被控制或抵消³。

（二）关税与国内政策的结合

万斯的策略并非仅仅依赖关税这一单项工具。他深知，要真正吸引和留住制造业投资，必须将关税政策与一系列旨在优化国内营商环境的亲商政策相结合，打出一套内外兼修的“组合拳”。核心思路是在利用关税形成外部“推力”的同时，通过国内改革创造强大的内部“引力”。这套组合拳的国内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大幅削减企业税负，特别是通过实施如资本投资 100%奖金折旧、研发费用全额抵扣等具有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考虑将这些优惠延伸至工厂建设等领域，以此降低在美国本土投资和创新的财务门槛³；

二是全面放松管制，致力于清除他眼中束缚企业活力、增加运营成本的各类行政法规，为企业创造一个更自由、更高效的经营空间^{3,6}；

三是大力推动能源自主，通过增加国内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的供应来压低能源价格，

从而降低制造业的关键生产成本^{3,6}。

这一系列国内政策的协同发力，旨在创建一个对资本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洼地，确保响应“在美国本土建设与制造”号召的企业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和竞争优势^{3,6}。

（三）差别化关税与地缘政治挂钩

万斯主张的关税政策并非一视同仁，而是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和选择性，并直接与地缘政治考量挂钩。这意味着关税税率和应用范围将依据不同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其贸易行为以及在安全等领域的立场进行差别化对待。对于被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或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如他经常批评的中国），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施加惩罚性高关税⁶。而对于邻国如墨西哥和加拿大，关税则可能被用作一种强大的胁迫工具，迫使它们在诸如加强边境管控、阻止非法移民和合作打击芬太尼贸易等美国极为重视的安全议题上承担起更大责任，并与美国的要求保持一致^{8,9}。万斯政策思想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将贸易政策工具化，使其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移民控制等地缘政治目标，体现出他试图打破传统经济与安全领域界限、以国家利益优先和实力运用为导向的国际交往模式。

四．技术、能源与创新政策

（一）拥抱并力求主导前沿技术

万斯展现出鲜明的“技术乐观主义”色彩，坚信美国不应惧怕，而应积极拥抱并力求主导人工智能（AI）、先进半导体等决定未来的前沿技术^{3,5}。他驳斥了那些过度担忧技术（特别是 AI）会大规模取代就业、带来社会动荡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真正的技术创新能够增强国家整体实力，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工作尊严，而非简单地替代^{3,5}。他以 ATM 机并未减少银行柜员反而提升其工作价值为例，论证技术进步通常会创造新的、更有趣、更高薪的岗位。因此，在他看来，畏惧和过度限制 AI 等技术的发展是错误的，美国必须抓住机遇，“寻求主宰它们”⁵，并认为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需要，更是战略上的必然。他强调，美国必须确保在全球 AI 竞赛和先进半导体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并将最强大的 AI 系统和关键芯片的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技術主权⁵。

（二）创新驱动与亲商环境

对技术主导地位的追求要求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万斯主张，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在于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经济”（pro-innovation economy）³。他严厉批评过度监管是扼杀创新的元凶，尤其是在机器人、生命科学、能源等他所谓的“原子世界”（实体经济）中，繁杂的管制使得“建设者”们举步维艰。因此，他倡导全面放松管制，并为创新者提供税收激励，特别是支持研发投入（如允许研发支出全额抵扣），以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热情。

在 AI 领域，他尤其反对采取过度预防性的、过早的监管措施，认为这可能会扼杀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⁵。他还警惕地指出，一些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可能来自希望巩固市场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而非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政策应保持公平竞争环境⁵。此外，万斯还强调，AI 技术的发展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束缚，不能被用作推行特定社会议程或进行言论审查的工具，以维护思想的自由^{4,5}。

（三）能源自主的关键性

支撑上述所有技术雄心和工业复兴计划的基础是能源政策。万斯将其置于极其重要的战略

地位。他明确指出，充足且廉价的能源供应是美国制造业复兴以及发展 AI 等高耗能新兴产业的绝对前提^{3,5}。任何关于工业回归和技术领先的讨论，如果缺乏可靠、经济的能源，都将沦为空中楼阁。因此，他力主推行“能源主导”（Energy Dominance）战略，核心是大力发展美国本土能源资源，特别是他认为可靠且成本低廉的化石燃料⁶。为此，他激烈批评拜登政府的绿色能源政策（称之为“绿色新骗局”）以及相关的环境法规，认为这些政策人为限制了能源供应，抬高了能源价格，直接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潜力⁶。他还以欧洲为例，认为其在能源政策上的错误选择是导致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并反复强调，要想在 AI 领域领先，美国必须首先在能源生产领域领先^{3,5}。

五．国际关系与安全观念

（一）对欧洲盟友的要求与批评

万斯在处理与欧洲传统盟友的关系上采取了务实且带有批判性的态度。虽然他口头上承认双方拥有“共同价值观”⁴，但他更着重批评欧洲长期以来在国防开支上的不足，直指其在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下的“搭便车”行为，并明确要求欧洲必须在未来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实现更公平的“负担分担”^{4,9}。更深层次的批评指向欧洲内部。万斯对所谓欧洲“价值观退却”表达了深切忧虑，具体列举了言论审查日益严格、宗教或保守派异见受压制、对选举结果的干预（以罗马尼亚为例）以及最令他关注的大规模移民失控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不仅代表了欧洲内部治理的失败，更威胁着其民主制度的根基和社会活力⁴。尤为关键的是，万斯将这些内部问题与美欧安全关系直接挂钩，他强烈暗示如果欧洲不能正视并解决上述内部挑战，且无法满足美国在防务等方面的期望，那么美国提供的安全承诺也可能不再无条件保障，其可靠性将受到动摇⁴。这种立场体现了万斯高度交易性、附带条件的同盟观。

（二）务实的冲突解决路径（以乌克兰为例）

对于如何处理国际冲突，万斯的立场体现了强烈的“美国优先”务实主义色彩。以乌克兰战争为例，他关注的核心并非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如何以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尽快结束冲突。他认为，无休止的军事援助对美国、欧洲乃至乌克兰自身都是不可持续的负担⁹。因此，他主张将援助与促使乌克兰进行和谈直接挂钩，视援助为施压谈判的杠杆，而非无限投入⁹。不仅如此，他还强调美国需要从其巨大的财政投入中获得实际回报（例如通过潜在的矿产资源协议），并确保美国在援助条款中得到“公平对待”，不应逊于欧洲盟友⁹。万斯的外交决策的目标并非无限期支持某一冲突方，而是以结果为导向，寻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美国负担、保障美国利益的解决方案。

（三）边境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核心

在万斯的国家安全优先序列中，移民和边境控制问题似乎占据了比许多传统地缘政治议题更核心、更紧迫的位置^{7,8,10}。他对这一议题持极为强硬的态度，将其视为维护美国主权和国内福祉的根本。万斯主张采取一切必要且强有力的手段来阻止非法移民，包括但不限于：实施大规模、快速的遣返行动⁸；完成并强化边境墙等物理屏障的建设⁸；广泛运用监控技术加强边境

管理⁸；坚决反对并取消所谓“庇护城市”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联邦执法⁷；甚至考虑将墨西哥贩毒集团指定为恐怖组织，并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打击⁸。

万斯之所以如此重视边境问题，是因为他将其与一系列严重的美国国内问题直接相关联。他认为，失控的边境是导致国内房价高企、令普通人难以负担⁷，地方医院和学校等公共资源不堪重负，以及芬太尼等致命毒品泛滥⁸的关键原因之一。因此，在他看来，严控边境不仅是执法问题，更是解决诸多国内社会经济痼疾、保障国家安全的治本之策。

六．潜在影响与风险

万斯所倡导的一系列旨在重塑美国经济和国际角色的政策，虽然目标明确——复兴美国工业、提升工人福祉、确保国家安全——但其激进的手段和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性，也蕴含着深刻而广泛的潜在影响与风险。这些风险会在国际层面和对美国国内产生复杂甚至负面的后果：

(1) 国际贸易体系重塑与潜在冲突：大规模运用关税和推行保护主义可能导致全球贸易规则重写，加剧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

(2) 盟友关系紧张与重构：对盟友在防务开支、贸易让步和价值观上的强硬要求可能疏远传统伙伴，促使全球联盟体系发生变化。

(3)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美国安全承诺的调整、在地区冲突中更强调自身利益的立场，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增加冲突风险。

(4) 国内经济影响：虽然旨在重振制造业和工人收入，但关税、移民政策的调整也可能引发通胀压力（万斯试图通过其他政策加以对冲）、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以及特定行业的阵痛。金融市场可能因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汇率战”而加剧波动。

七．结语：万斯的政策逻辑

万斯的国际政治经济理念清晰围绕着一个核心逻辑——“美国利益优先”。这一原则贯穿于他对内对外问题的诊断、政策目标的设定以及具体工具的选择。他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诸多困境，其根源在于过去数十年所奉行的特定全球化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政策失误。这些失误忽视了制造业的基础作用和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这一点由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对“铁锈地带”现实的观察所印证²。

基于这一诊断，万斯开出了一套系统性的“药方”，旨在通过强力干预来扭转局面。这套“药方”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在国内，实行以强力贸易保护主义（他认为关税是最核心、最灵活的工具）为外部屏障，辅以内生的积极产业政策（包括大幅减税、放松管制、推动能源自主，特别是化石能源）和极其严格的移民控制，三者合力以期重振美国经济基础，特别是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复兴^{3,6,7,8,10}。

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万斯倡导一种更具交易性、且较少受传统意识形态束缚（除非涉及他所定义且与国内议程相关的“核心价值观”，如他对欧洲内部问题的批评所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这意味着在同盟关系中，美国将不再扮演无私的领导者，而是会明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经济和防务责任，并将安全承诺与盟友在其他领域的配合度挂钩。对于被视为竞争对手或威胁的国家，则将采取更加强硬直接的对抗姿态^{5,9}。

万斯在论述中特别尝试弥合“民粹主义者”和“技术主义者”这两股看似矛盾的力量。他一方面深刻响应了民粹主义者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失业、身份失落和社会问题的不满；另一方面又积极拥抱技术创新（尤其是 AI）的潜力。他努力论证二者并非不可调和，而是可以统一在“美国工业复兴”的旗帜之下：即技术创新应服务于国内产业升级和工人福祉的提升，而非加剧不平等或取代劳动者³。

万斯的政策体系展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无论贸易、技术、能源、移民政策，还是外交和安全策略，都指向服务“美国优先”和国内制造业复兴这一根本目标。然而，如此高度聚焦且颠覆性的政策框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它可能颠覆现有国际贸易和安全秩序，引发广泛的国际冲突和国内经济社会动荡。因而，这些主张一旦付诸实践，其最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国际社会复杂反应，以及对过程中各种风险和不可预见冲击的管控能力。

这是一条充满雄心但也布满荆棘的重塑之路。

参考文献

1. 鞠建东,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2. J.D.Vance,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6
3.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American Dynamism Summit.”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5
4.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in Bay City, Michigan.”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5
5.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Confere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5
6.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Prior to a Discussion in Eagle Pass, Texa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5
7. J.D. Vance. “The Vic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nd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ulsi Gabbard in Eagle Pass, Texa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5
8.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in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5
9. 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on Summit in Paris, Fra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5
10.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5

附录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各章小结

第一章 国际争端为什么会发生？

本章首先介绍了全书的主题：理性、共存，用理性的方法分析大国的竞争共存之道。理性分析要突破当代经济学的约束条件下最优化的分析框架，而大国共存则需超越数千年来霸权更迭的世界秩序传统思维。

国际贸易争端产生的本质原因是，国家之间存在整体、长期与局部、短期的利益冲突。本章建立的国际贸易争端三大原理，提供了国家之间整体、长期利益冲突的分析框架。

第一个原理是比较优势原理，这也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最基本的原理，阐述了各个国家如何按照机会成本来确定国际分工，提高跨国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个原理是跨国垄断利润原理：国际贸易活动中，一个国家或其企业利用其在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获取跨国垄断利润，对跨国垄断利润的争夺会引发国家之间整体利益的冲突。当代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技术垄断、金融垄断、规则垄断和军事垄断这四个方面来实现。

第三个原理是分工固化的增长陷阱原理：即使在理想的自由贸易状态下，如果技术是外生给定的，自由贸易会打破“资本报酬递减原理”，使得穷国与富国的资本报酬趋于一致；使得穷国固化在劳动密集型的国际生产分工中，失去产品升级、从农业化向工业化、从加工到创新的结构转变的动力；掉入低增长的陷阱，形成穷国恒穷、富国恒富的国际收入分配格局。穷国要打破分工固化的增长陷阱，会引发与富国在长期利益上的冲突。

第一个原理解释如何通过国际分工将全球产出之饼做大，而第二与第三个原理解释在划分全球产出之饼上的国家利益冲突。

第二章 经济总量如何增长？

经济总量(GDP)的长期增长既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也代表了它的长期、总体的利益。

当代经济学关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外生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外生增长理论发现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技术进步的来源。外生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宏观层面研究经济增长的现象，但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缺乏对经济增长微观与宏观机制的分析。

本章提出经济增长的微观与中观机制。在微观机制上，我们提出“双轮驱动模型”，强调技术创新和市场规模的良性循环；在中观机制上，我们提出“增长定理”，即一个经济体保持长期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

按照经济活动的四个步骤，创新、生产、交换（贸易）、消费（市场），本章将全球化分为全球发现时代（1500 年-1819 年）、全球贸易时代（1820 年-1978 年）、全球生产时代（1979 年-2018 年）和全球创新时代（2019 年-）。我们发现，全球化在各个阶段的推进，伴随着全球垄断形态的演变：在全球发现时代，产品市场的全球垄断得以解放，转化为在贸易段的垄断；在全球贸易时代，贸易的全球垄断得以解放，转化为生产的垄断；在全球生产时代，生产的全球垄断的得以解放，转化为创新的垄断；而在当今的全球创新时代，创新的全球垄断又会向何种形态转变？

第三章 大国如何竞争

通过分析大国竞争的普遍规律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竞争特点，本章建立了大国竞争的 6 领域-3 要素-5 阶段的分析框架：即大国竞争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等 6 个核心领域展开，两国关系由相对实力、政治和文化认同度、第三方效应等 3 个要素决定，以及据此提出的中美两国关系的对抗（1949-1978）、小国-大国（1979-2016）、大国竞争 I（2017-2035）、大国竞争 II（2035-2060）和竞争共存（2060-）等 5 个阶段。

当崛起国的制造业总量赶上守成国、经济总量达到守成国的 60%，两国进入大国竞争阶段。中美两国于 2016 年进入大国竞争阶段，当前处于大国竞争阶段 I。在大国竞争阶段 I，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在 2035 年前后在经济总量追上美国；在大国竞争阶段 II，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在 2060 年前后在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等 4 个领域赶上美国。

第四章 解析关税争端

本章首先介绍三大定理，首先是国家之间局部利益冲突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即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增加这个国家丰裕要素的收益，但降低这个国家稀缺要素的收益，在短期增加出口部门的收益，但降低进口部门的收益。

然后是短期利益冲突的最优关税定理与技术竞争的希克斯定理：即当关税政策或技术政策相对增加这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但降低进口产品价格时，这样的关税政策或技术政策有可能改善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至此，与第一章的三大原理一道，我们建立了贸易争端的长期、整体、局部、短期利益冲突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来解析中美贸易争端。

2018年3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301调查报告”，提出市场准入，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产业政策与国有企业等四个表面原因。深入分析中美关税争端对两国贸易平衡、社会福利与贸易结构的影响，我们发现中美争端更加本质的原因在于两国在长期、整体、局部、短期利益上的冲突。

第五章 镜像策略：如何避免对抗

本章讨论大国竞争的战术。毛泽东在如何避免国共冲突、一致团结对外方面提出过16字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方面，毛泽东也总结了8字原则，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们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称之为“镜像策略”，因为我方的策略看起来就像对方策略的镜像。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我们证明了“镜像策略”是避免对抗、实现合作的纳什均衡。

以中欧光伏和葡萄酒关税争端为例，我们分析了镜像策略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对抗。接下来我们分析美国对跨国公司的长臂管辖，因为涉及到长期、整体利益的冲突，中美争端不仅需要在战术层面选取最优策略，更重要的是战略方向的制定与实力的竞争。

第六章 三足鼎立：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

全球基本矛盾，即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决定大国竞争的战略。本章讨论全球经济基础，即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

通过分析全球贸易、生产和消费网络结构，我们发现它在 2000 年呈现出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的两极格局，而在 2019 年它转变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价值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的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一转变标志着全球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

进一步分析核心国家在各自区域的地位，可以发现北美价值链、亚洲价值链形成大国/小国的“轮轴-辐条”模式，而欧洲则呈现出“多国合作”的模式。

第七章 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矛盾

全球上层建筑的第一个内容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金本位制到至今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

尽管全球经济基础已经由美国主导转变为美、亚、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主导。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收取“国际铸币税”，即通过发行货币获得收益，同时将通货膨胀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也可以将美元武器化，作为制裁、打击其他国家的工具。因此，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与单级货币体系之间的不匹配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矛盾。

这个矛盾使得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解决基本矛盾可能有“趋同论”，“去中国化”，以及“多极国际货币体系”三种思路。建立一个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与全球经济基础格局相匹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第八章 世界秩序基本矛盾

全球上层建筑的第二个内容是全球治理体系。二战之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经历了苏联解体之后，演变为美国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三足鼎立结构，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不匹配是世界秩序基本矛盾。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源于各国国家主权与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冲突、各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以及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

当全球化进入到全球创新阶段的当代，霸权更迭的旧的世界秩序范式已经结束，而竞争共存是新世界秩序的方向。将世界失序归因为中美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是严重的误导，世界失序是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表现。

全球治理体系可以有全球与区域双层。多边的归多边，区域的归区域，建立三足鼎立的双层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

第九章 什么决定大国竞争的未来

大国竞争的赢者获得更高的经济总量增长率，而输者的经济总量则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据此，我们建立了大国竞争的“增长-危机”分析框架。

在大国竞争的环境下，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增长具有多重均衡。如果一国的经济总量达到潜在增长率、实现最优增长，我们将其最优增长路径定义为正常增长均衡；我们将不能实现其最优增长路径的其他路径定义为危机增长均衡。当一国发生危机时，其经济陷入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从现在到 2060 年，中美竞争有 4 种可能的未来（均衡）。第一，A 均衡，中美皆实现其潜在增长率，我们称之为双赢的均衡。第二，B 均衡，美国实现其潜在增长率，而中国发生危机，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的一半；第三，C 均衡，中国实现其潜在增长率，而美国发生危机，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的一半；D 均衡，中美两国都发生危机，经济增长率都低于其潜在增长率的一半。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大国竞争是外因，而竞争的结果则取决于哪个国家能够避免危机，实现其潜在增长率。

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可能面临日本式危机、苏联式危机、公共政策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和区域安全危机等 6 种危机。中国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体制改革，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作为守成国的美国可能面临公共政策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宪政危机和区域

安全危机等 6 种危机。

分析当代大国竞争的危机演变路径，我们发现：第一，中国保持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健康增长；第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与美元分担战争风险；第三，中美形成区域对称的军事实力，是中美实现国际秩序基本和平转换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十章 技术竞争

技术创新通常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渐变型技术创新，另一种是突变型技术创新。所谓渐变型技术创新，是指通过对旧科技的更新迭代逐渐积累实现的技术进步；而突变型技术创新是一种颠覆性、破坏性的技术变革，新的技术与旧的技术没有传承关系，采用新的技术意味着放弃旧的技术。前者如芯片技术从 28 纳米、14 纳米，10 纳米一步步发展迭代到 7 纳米、5 纳米、3 纳米；后者如电力技术对于机械技术、数码照相技术对于胶卷技术、新能源汽车的电动机对于汽油车的发动机的替代。

渐变型技术竞争是技术的积累，其规律可以总结为“研发投入竞赛”，在竞争中追赶者常常处于下风，容易落入“追赶者陷阱”。突变型技术竞争是新旧技术的选择，领先者在旧技术上越是领先，选择新技术的机会成本越高；追赶者因为在旧技术的落后，反而在新技术的使用上具有比较优势，往往后来者居上，而领先者则容易落入“领先者困境”。

当代技术竞争两大领域，人工智能与非化石能源，前者具有渐变型技术创新的特征，而后者具有突变型技术创新的特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暂时领先，但在非化石能源领域可能落入“领先者困境”；中国在非化石能源领域暂时领先，但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落入“追赶者陷阱”。

打破“追赶者陷阱”的关键，是在本国暂时落后的技术上形成“创新-市场”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必须通过国家政策的干预。成功的政策有三个原则：第一，保证本国暂时落后的技术具有一定份额的市场需求；第二，在技术的供给侧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三，技术市场是开放的，能够跟上世界先进技术的步伐。

渐变型技术与突变型技术的竞争规律的区别同样适用到大国在国际金融、全球治理、与军事等其他领域的竞争。

第十一章 国际金融竞争

美国在当代国际金融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创造国际金融领域的突变型技术创新是中国赢得国际金融竞争的关键。

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优势地位，第一，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征收美元国际铸币税，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高科技研发、关键产业，从而补强美国实体经济、重构全球价值链；第二，利用美元进行金融制裁，制造中国金融危机与金融封锁双风险。因此，防范金融危机与金融封锁双风险成为中国在国际金融竞争的主要任务。

本章提出货币政策与货币技术两个方向的突变型创新。第一，构造“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也就是资本流动防火墙，形成第四个国际金融政策工具。跨境资本流动累进税既保证了正常情形下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又对于异常情形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通过征收累进税的方法进行有效抑制，在危机情形下对国际与国内金融市场有效隔离，从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第二，构造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平台。当前跨境支付体系的优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覆盖面广，具有强大的网络外部性，第二是安全、风险低；其痛点也主要有两个：一是交易从发起到结算的周期长，二是交易成本过高。新的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平台需要克服两个难点：第一，确定适当的汇率，使得平台内部不能循环套利、平台与外部市场之间也不能套利；第二，其交易成本比现有跨境支付体系要低。一旦克服这两个难点，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就将出现。

第十二章 全球治理体系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贸易治理体系具有四大原则，非歧视原则、公平竞争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与透明原则，当今这四大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挑战，世界经济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在中美的全球治理体系竞争中，美国采取了“投资、结盟、竞争”的方针，即投资自己、联合盟友、与中国竞争，其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在全球价值链上“去中国化”，改变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产业“过度依赖”中国的状况，“使中国边缘化”。第二，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与

产业升级，保证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全球霸权地位。

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策略，中国最优的博弈策略是“有限反击”：建立“亚洲共同体”，在“亚洲”区域重建 WTO 规则。

“亚洲共同体”的目标短期以技术市场和数据市场自由化为目标，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国际技术垄断联盟。中期致力于强化亚洲经济共同体，逐步实现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长期建立类似于欧盟、具有亚洲特色的亚洲治理体系，使其成为全球经济“三足鼎立”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极。

“亚洲共同体”的建设原则是“以市场换规则”，以中国市场的单边开放换取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守 WTO 规则。其建设路径是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先易后难，有序进入。

美国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领域的突变型创新同样是赢得竞争的关键，而“亚洲共同体”的构造就是这种突变型创新，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超越传统的囿于地理范围的秩序建设，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专注于相互依赖经济体的共同市场秩序的构建；第二，超越传统的军事手段，通过对共同体成员进入与退出的动态管理，构建各成员激励相容的“亚洲”秩序；第三，超越传统的争霸思维，三分天下只主导其一，构建三足鼎立、竞争共存的新世界秩序。

第十三章 创新世界

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动力，本章试图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对创新世界给出规范、系统的初步描述。

创新源于“想法(idea)”，创新的过程可以总结为“想法→创新→技术进步→市场实现”。相应的，人类的创新活动从抽象至具体、由直接到间接分为四个阶段：产生想法、转化知识、提高生产率、实现价值。

创新过程包括两个循环，第一个是创新者与想法云的循环，第二个是创新者与研发机构、市场的循环。在第一个循环中，创新者从想法云中随机抽取想法，而创新者大脑产生的新想法也反馈给想法云，成为想法云的一部分。在第二个循环中，当创新者获得一定质量的新想法之

后，结合劳动、资本和其他中间投入从事研发活动、进行创新，生产出新的技术。新想法的质量越高，创造出来的新技术就越好。新的技术在市场上实现利润，转成研发投入，继续下一阶段的创新。

人类诞生以来，所有人的所有想法的加总集合，构成了想法云的一部分。本章将想法云的特征总结成五个假设：想法的质量服从帕累托分布、想法的质量分布是区域化的、想法的质量分布具有历史相关性、想法具有公共品属性、想法的演化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

创新世界有三个基本矛盾：第一，是集中创新，还是分散创新？第二，创新成果是公有还是私有？第三，是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一个好的创新体制，是这三对矛盾的平衡，而不同时期会有所侧重。

想法的垄断是创新世界的核心问题。对想法的垄断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市场垄断，第二是政府垄断。限制对想法的市场垄断，需要政府的力量来平衡市场垄断；而限制政府对想法的垄断，需要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市场竞争来平衡政府的垄断。

保证“想法云”面前人人平等是新世界的核心挑战，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为应对这个核心挑战提供了一个基础。

第十四章 十年战略（2024-2034）

本章总结全书，并提出中国在下一个十年的大国竞争战略。

中国在下一个十年的大国竞争战略目标就是 CDP 年增长率达到 5%，从而使名义 GDP 总量在 2035 年左右赶上美国。

中国实现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可以总结为九个字：不称王，稳市场，谋共享。

不称王：第一是指不试图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因为不可行、没好处、不应该！第二是指不与美国共治世界。所谓中美共治的实质就是不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只是作为美国实力的补充，帮助美国管理世界。“中美共治”的观点似是而非，其核心问题是看不到中美关系的阶段性变化与中美利益冲突的结构转变。在大国竞争阶段，“中美共治”的结果就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被遏制，落入追赶者陷阱，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

稳市场：在 20 亿到 25 亿人口的“亚洲”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秩序，我们称之为“稳市场”。稳市场包括建立“亚洲”秩序、稳技术市场、稳资本市场。建设“亚洲”秩序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主导制定亚洲共同体的规则与治理体系。第二，保持“亚洲”市场的稳定与繁荣。第三，维护成员经济体的动态进入和退出。稳技术市场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建立亚洲技术市场的“研发→创新→市场→利润”良性循环；第二，保护亚洲技术市场的竞争。这两方面要求的核心都是反垄断，尤其是反国际技术垄断。对于国际技术垄断，无论采取什么政策措施，本质上，都需要培养本土技术的竞争力。而本土技术的竞争力，需要一定的市场份额来培育、发展。在复杂多变、危机四伏的国际金融市场，稳资本市场就是通过主动制定新的资本市场规则来规避风险、稳定市场。

谋共享：关键在于想法、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共享。人类的创新本质上是集体行为。新世界的创新有四个本质要求：第一，由全人类共同参与；第二，成果为全人类所共享；第三，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第四，人性在创新活动中得到升华。我们寄希望于中国为新世界带来一个共创、共享、共同发展、共同升华的创新体系。

【获取链接】<https://3.cn/2e5-BCUA>